

民国时期女校长的主体言说与无声抗议

——以湖南《大公报》的报道为中心

万琼华

内容提要 1922年省立三女师校长欧阳骏和省立一女师校长童锡帧相继被湖南《大公报》推上舆论前台,成为受众注目的中心,尤其是“省立一女师学科不完全”问题披露后,引发知识界精英男性长达1个月余的联手围攻。梳理此期发表的相关报道,发现她俩应对策略迥异,前者采攻势,后者采守势,相映成趣;将两事件置于湖南特定的历史境遇下考量,可解读出女校长成为报道中心的原因所在,进而了解民国时期职业女性面临的尴尬处境及背后渗透的社会性别权力博弈。

关键词 女校长 主体言说 无声抗议 湖南《大公报》

万琼华,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410012

清末以来,知识精英提倡女权的风潮,刺激愈来愈多女性追求经济自主与自我实现,职业妇女成为近代新崛起的阶层,她们最早进入的职业是工人,随后是教师和医生^[1]。20世纪20年代,涉足的行业更多,其身影频繁地出现在教师、医生、律师、作家等专业领域。此期,湖南教育界悄然兴起一个女校长群体^[2],尽管人数不算多,但她们的言谈举止、思想观念和治校方略足以引起社会大众的注目^[3],甚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在责任与权利之间: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研究”(12YJA-ZH130)阶段性研究成果。

[1]何黎萍:《试论近代中国妇女争取职业及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北京〕《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女校长群体中主要成员包括:陈椒,郴县人,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理科,任长沙女子蚕业讲习所所长,1921年4月被推选省宪法审查员中唯一的女审议员。曾宝荪,湘乡人,毕业于伦敦大学理科,系中国第一个理科女学士,1918年创办艺芳女校,自任校长(一度兼任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校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吴家瑛,湘乡人,留学日本,任溆浦女学校长,兼省议会会计课员。周天璞,任建本女校校长。唐群英,衡山人,1904年东渡日本,民初创立全国性女子参政会,失败后在湖南创办长沙女子法政学校、女子自强职业学校和女子美术学校。张汉英,湖南醴陵人,1905年公费留日,民初领导女子参政运动,失败后回湖南创立“湖南女子参政同盟会”和醴陵女子学堂,自任校长兼教员。黄国厚,长沙人,毕业于日本东京青山实践女校,1919年任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校长。

[3]童锡帧,宁乡人,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理科,1919年任省立一女师校长。1921年11月3日,童随同几位男性校长前往省署开会,遭卫兵阻拦,称奉有“女子不可入内”命令,后虽进入,但“饱受虚惊”,此事引起校长们的不满,向省署投

至能牵动知识界精英男性敏感的神经。省立三女师校长欧阳骏^[1]和省立一女师校长童锡帧于1922年相继被湖南《大公报》^[2](下文简称《大公报》)推至舆论前台,引起受众的热切关注、精英男性的持久论辩可为例证。本文以文本解读方式考察《大公报》是怎样为女校长“发声”提供舆论平台?男性报人又是怎样为风潮推波助澜?为何一面为欧阳骏伸张权利提供平台,一面却将童锡帧视为舆论靶子发起猛攻?力图藉由围绕女校长展开的报道与论战,再现早期职业女性面临的尴尬境遇及背后渗透的社会性别权力博弈。

一、主体言说:欧阳骏与照相馆之风潮

1922年7月12日至23日,《大公报》连续刊登7篇时论,对省立三女师校长欧阳骏与照相馆之间的纠纷予以追踪报道,首篇更冠以“风潮”二字,直截了当地将私人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从而吸发了社会大众的关注。

1. 缘起

《大公报》(7月12日)首发《女校长与照相馆之风潮》一文,拉开了欧阳骏与相馆之间纠纷的序幕。事情经过极简单:某日,欧阳骏去长沙锦华丽照相馆购买绣花时,无意中发现自己十年前留日时着东洋女子装束的照片,被相馆与妓女照一起挂在门前,当即要求取回。相馆辩称相片系从东信洋行购得,“取去非备价不可”。此言激起欧阳骏的愤慨,认为“该馆有意损人名誉,大闹而去”,旋即向警厅报案。警厅派员调解后,相馆同意拆下,但要求先付款后交还^[3]。

2. 双方辩驳

围绕是否备价收回的问题,双方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不期被记者公诸报端,《女校长与相馆之风潮》《女校长大闹相馆者》等文相继出炉,聚成事实上的“风潮”。为回应“失实传闻”,澄清事实,欧阳骏主动出击,撰文申辩,辨正理由如下:其一,相馆未经本人许可,擅自陈列,任意售卖,违背法律。其二,相馆将照片杂陈于妓女行列,是“视良家女子相片如同玩物,牺牲他人名誉以图私利”。其三,相馆无视法律尊严,“省宪第二章第六条规定人民有保护其身体生命之权”,相馆却视女子名誉于不顾。最后谴责警厅渎职,“不责其赔偿名誉而反赔偿其血本”,表面上息事宁人,实则“坐视女子名誉被人损坏”^[4]。

针对欧阳骏的申辩,警厅第二天代馆主予以回应,陈述理由如下:其一,相片系从东信洋行购买,悬挂6年之久,并不知是何许人的;其二,称相片“与各大伟人男女绘相同列”,而不是“杂陈于优妓之中”;其三,相片与本人容貌相差甚大,按营业惯例,若不能确定相片系本人,除“备价外,须取具铺保”;其四,经欧阳声明后,“姑无论其相是否即为该女士之相”,已收置楼上,以示尊重。最后,警厅表示认同相馆的要求,或备价收回或由相馆收藏,不再悬挂^[5]。

诉。省署卫队营长和政务厅惩办了卫兵,并在报端公开致歉。女校长出入公共场所给时人带来的思想观念冲击可见一斑。参见《省署卫兵拒阻女校长之解释》,载湖南《大公报》1921年11月3日,《惩办拒阻童校长之卫兵》,载湖南《大公报》1921年11月4日。

[1]1921年因校款“支绌”,欧阳骏提出辞职,省署未批,办学业绩颇得省长赵恒惕首肯,参见《第三女师校长辞职未准》,载《大公报》1921年12月25日。

[2]湖南《大公报》于1915年9月1日创刊,是民国时期湖南地方报刊中最具影响力的民营大报,该报发起人及编辑主笔均为男性,他们新旧学问兼备,既传承了湖湘文化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精神,又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是长沙乃至湖南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

[3]《女校长与照相馆之风潮——双方出于误会》,湖南《大公报》1922年7月12日。

[4]《欧阳女校长来函辨正——与照相馆交涉之真相》,湖南《大公报》1922年7月14日。

[5]《警厅解决女校长与照相馆之纠纷——根据照相馆方面理由》,湖南《大公报》1922年7月15日。

对于相馆所持理由和警厅的调停建议,欧阳骏“颇为不服”,于7月17日再次投书,提出五点质疑:其一,为何警厅听取照相馆一面之辞,对于“假借外人势力”熟视无睹?其二,警察已目击相片悬挂优妓之中,为何附和相馆的不实之词?其三,明知相馆“牺牲女子名誉,以图私利”,为何警厅“犹曰维持商业道德”?其四,馆主怀疑欧阳骏系冒充者,为何警厅听任之?其五,警厅为何接受相馆“备价取回”要求,不计女子名誉?对于此条,欧阳痛陈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一则无法以儆效尤;二则令女子不胜其烦,“陈列售卖其他女子相片,不备价取回,于个人名誉有碍;备价取回,又不胜其烦”;三则商人若以此谋利,无法制止,质问“女子之名誉,与相片之血本孰轻孰重?”最后,质问相馆有何权利收藏良家女子相片,并以嘲弄的口吻讽刺厅长:“今贵厅长之办法反不如一警士之办法”,申明此举“不特骏一人之私举,女界全体均受赐矣”^[1],由己推人,不露痕迹地赋予其社会意义。

3. 女界声援,纠纷解决

上封公开信发表后,引来女界同仁的声援。7名女士联名写信,由唐恩缙、钟侣琴自亲送至《大公报》编辑部,请求刊登。

联署信站在女界立场,针对警厅代相馆陈述的理由提出质疑:首先,“同人等均以为此种损害女子名誉蔑视女子人格之举,自应严重处罚,以儆效尤”,厅长偏信相馆一面之词,不予惩治,道理何在?其次,厅长附和相馆“备价取回”要求,不考虑可能给良家女子名誉带来的损害,“此项问题关系女界全体,并非欧阳校长一人”,道理何在?最后,强调女界同仁决不接受警厅的处理办法,要求严惩相馆^[2]。

也许是女界声援发挥了效力,几天后,处理结果来了个大逆转。警厅不仅无偿追回相片,还承诺下令禁止相馆陈列及售卖良家女子相片。也就是说,欧阳骏和女界同仁提出的两项要求均获许可。欧阳对此深表满意,感慨道:“夫一相之价,能值几何?骏必欲取回此项相片者,实为保障女子名誉,并非贪图便宜”,为示非贪图便宜,将相片撕破后送还警厅,请警厅转交相馆,同时不忘提醒警厅尽快兑现承诺:“仍请从速明令各相馆以后不得陈列及售卖良家女子相片”^[3]。至此,这一纠纷已圆满解决。

二、无声抗议:童锡帧与“第一女师学科不完全”事件

欧阳骏与相馆之间的纠纷尽管一波三折,但最终为女子肖像权打了一场胜仗。有趣的是,此剧刚刚落幕,另一场由“第一女师学科不完全”引发的对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下文简称一女师)校长童锡帧的舆论讨伐战又拉开帷幕。

1. 缘起

事件起因于《大公报》主笔黄醒7月7日参加的一女师第八班毕业典礼^[4]。典礼上,黄从教务主任周受中发言中得知该班因受军事及罢课影响,没授教育学,出于对女子教育的担忧,他说了“几句不平的话”,却引来罗白庵、蔡渔春两先生的问难与责骂。激于义愤,于7月29日在《大公报》发文,将师范

[1]《女校长与照相馆交涉未了——欧阳校长质问警厅》,湖南《大公报》1922年7月17日。

[2]洪煜、范新志、李左汉、陈王钰、唐恩缙、黄孟衡、钟侣琴启:《女界为欧阳骏抱不平——联名致函警厅》,湖南《大公报》1922年7月19日。

[3]《女校长与照相馆交涉解决矣 警厅追回相片——并拟定取缔条例》,湖南《大公报》1922年7月23日。

[4]黄醒披露的问题其实早在7月8日的《大公报》刊载。通讯写道:毕业典礼上,名叫黄胜白的家长发言时,直言“对于此次毕业之成绩大为失望。例如与师范生最有关系之教育学、伦理学二门均未经教授,及其他理化数矿等科均未及教完。将来无论升学及服务,恐均难收良果。”为此,周受中向家长致歉,并言“此次所缺各项功课,实因事实上之时间及经济的困难,致未能延长授业期间,颇为遗憾。”参见《稻田女校毕业参观记——家长大煞风景,主任深致歉辞》,湖南《大公报》1922年7月8日。21天后黄重提旧事,想必期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吧?因无证据,只能猜测而已。

生是否应受教育学的问题抛给湖南教育界的“诸位先生”^[1],以求“舆论公判”^[2]。

8月5日,署名“主尧”的读者率先呼应,谴责罗、蔡的骂人行为,批评其“不反省诸己,深自引咎,反大言不惭,钳制舆论”,进而发出一连串的质问:“试问自治省份的人民有言论自由权吗?第一女子师范在自治省份女教育界占有极重要地位,人民有言论自由权吗?教育学为师范生所必授,今只务毕业之虚名,而把最重要的学业不教授,我们有发言的价值吗?”^[3]句句击中要害,咄咄逼人,让校方无法逃避。

果然,校方翌日作出回应,坦承“第一女子师范年来呈无进步,已为各界所不满”,“童校长因此三次辞职,以避资路,嗣经省署婉辞慰留勉为其难”,并称“拟另聘教务主任,以资改良”,以示接受批评^[4]。但导火索已点燃,自我检讨无济于事,舆论批判的风浪席卷而来,呈不可阻挡之势。8月8日,熊梦飞以“湖南教育界一个紧急问题”为题发文,用带浓烈感情色彩的语气呼吁:“湖南底教育者呵!不要太无勇气了,大家把这个紧急问题来研究呵!”^[5]8月9日,杨柏荣更是惊呼“师范学校,不授教育学,真是亘古今,横中外,未之曾闻”,质问:“办师范学校的目的是什么?负有培养国民责任的师范生所应学习的是什么?不懂教育原理的人如何去教育儿童?”^[6]

为示慎重与公允,黄醒再次前往一女师实地调查,2天后公布一份更详尽的报告:八班未授课程除教育学外,还有伦理学、法制和家政学;未授完课程有中国史、外国史、矿物学、化学、几何、代数、外国地理、园艺学共8门^[7]。更新后的报告印证了前述事实,使“第一女师学科不完全”问题再度升级。尔后10余篇讨伐檄文纷纷出笼,围绕此事展开的舆论讨伐持续近1个月,直至8月23日知识界人士联名呈文要求撤查童锡帧,才告一段落。

2. 双方辩驳

针对接踵而至的讨伐檄文,一女师八班毕业生于8月13日联名发表公开信,为校方辩护。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引来兼公、黄醒、袁庸父和亚文等男性精英更猛烈的炮轰。

辩护信的观点可归纳为三:其一,学校已给学生教授教育史、实践伦理、修身、心理理论、管理等课程,教育学通论可“一览了然”,故不能说未修教育学课程;其二,举证曾宝荪、童锡帧任校长以来,锐意改革,更换旧教材,坚持开设英文,支持新学制改革等,质问道:“试问诸先生在三四年前,曾有半个堂堂男子为敝女子师范提议改良办法增加女子学问程度乎?”其三,针对有人将一女师称为“存古学堂”、“人间地狱”等诬蔑之词,亮出“新旧本无确定”、“苦乐本是一种心相”观点回击之。最后表达四种决心:决不教导他人子弟蹂躏女子、决不教导他人子弟扰乱社会、决不教导他人子弟信口诬蔑、决不教导他人子弟捐廉弃耻^[8]。

《大公报》主笔“兼公”率先作出回应,笔调中透着理性,首先提示此文针对八班毕业生说的,认为

[1]这里的“诸位先生”包括曾任或仍在任校长的吴劭先、刘寅先、孔竞存、朱剑凡、姜咏洪、贝元微、董幼甫、文湘芷,参与1922年新学制改革的黎劭口、杨遇夫,以及热衷于教育研究的宋聘珍、杨柏荣、熊梦飞、彭静仁、唐正楠、余砥吾、王凤喈、陈奎生、黄衍仁等人。这份名单将知名的教育界男性几乎全部囊括在内,唯独排除了被公认为湘中教育界翘楚的曾宝荪。参见黄醒:《质问湘中各教育家及第一女师范学生个家长。初级师范生不应学教育学》,湖南《大公报》1922年7月29日。

[2]黄醒:《质问湘中各教育家及第一女师范学生个家长。初级师范生不应学教育学》,湖南《大公报》1922年7月29日。

[3]主尧:《我对于动口骂人的先生们进一忠告》,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5日。

[4]《稻田女校近讯》,湖南《大公报》8月6日。

[5]熊梦飞:《湘教育界一个紧急问题。第一女师学科不完全》,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8日。

[6]柏荣:《读了“湘教育界一个紧急问题”以后》,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9日。

[7]黄醒:《关于第一女师八班课程之又一报告》,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10日。

[8]《来函》,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13日。

“诸位先生”的批评出自好意,学生应心存感激,最低限度是“犯不着以不被攻击的人,定要出来替被攻击的人诋毁一阵;更犯不着因为要替被攻击的人辩护,遂不问攻击的人来意好歹”。其次,指出教育学作为一门主要科目,学生的确可自学,但校长和教务主任有“应尽的职务”(完全教授各门主要科目);最后,提出“应该丢开‘旧’的问‘新’的方面走,去开‘苦’的向‘乐’的方面走,才觉得人生有意识,有趣味。”^[1]黄醒同日也发文辩驳,尽管“兼公”对信的真伪持怀疑态度,因“自首至尾,通口都像富于官场习气的学校办事人的一种饰非拒谏的口吻”^[2],但黄却断言为“假托该校八班学生的名义发传单骂人”。基于此,他愤怒地谴责:“果真理直气壮,何妨用真姓名真面目出来辩论?便是第八班学生中有人不服我们的论点,也可以用真姓名出来讨论”,继而分条批驳:首先列举数条证据论证未授教育学之事实;其次,质问童既实行“增高程度”,为何重要功课不教完?何故不延长第八班修学期限?其三,指出师范教授教育学与新旧并无关系;最后表明态度:“学校敷衍学生、敷衍政府、敷衍社会,我们是不承认的。蹂躏女子的一般社会之蠹,尤其是我们所要攻击的。”^[3]

8月16日,袁庸父发文声援。首先对“第一女师学科不完全”问题能引起社会热烈讨论表示赞许,对校方不“默认过咎甘受咤责”,反写信辩护表示不解;其次,对辩护信认为《大公报》报道“传闻失实”说法不赞同;其三,不接受教育学通论可“一览了然”的观点;其四,对于女子教育,认为“全人类皆有督责和维持的义务”,“断不能任之何人之专制和包办而不顾的”;最后面对八班毕业生提出忠告,希望她们站出来声明,以利于舆论公判^[4]。

3. 童锡帧成为舆论讨伐的靶子

在十余篇长篇大论中,除一女师八班女生的辩护信外,几乎是呈一边倒的声讨檄文,靶子无一例外、或隐或显地指向校长童锡帧。

熊梦飞写道,尽管自己在外地工作,但早就听说一女师“办法腐败”,“教职员思想顽固”,“组织不完善”,“学生精神呆板”等,此次重回湖南,教育界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该校仍无改进,认定根源在于校长,遂质问道:“无论旧部章或新学词上所规定的师范学校学科中,都有教育学一门,难道堂堂东京女师毕业的——童校长,并这点儿常识没有吗?”^[5]以童的留日背景讥讽其欠缺基本“常识”。柏荣也发出类似质疑,感情色彩更浓:“何能以受东亚先进国最高女子教育的童校长,而竟如此昏聩,其影响于他的门弟子间不算什么?其害及于前途无限光明的儿童的精神和生命则甚大,要我们何能不痛哭?要我们何能忍而不言?”^[6]黄醒的言辞最为过火,将童氏办学称为“贼人自贼”、“自骗骗人”,指责她将“女子最高教育机关做装饰品”^[7]另文中,对男、女师范进行比较后,质问道:“童校长有好计划,我也在厘叔先先生口中听见说过,也相信。但是计划不能用来空谈标榜的,是要实行的。若说财政困难,不能实行,男子师范同你们学校一样建立,何以敢实行他的计划?”^[8]

“亚文”措辞锐利,用一连串的惊叹号表达愤怒之情:“师范学校不授教育学,实所今世界未有之奇闻!湖南有不授教育学之师范学校,亦湖南教育界之奇事!”并指出,一女师备有1个教育科长,5个教育科员,6个省视学,竟出现未授教育学之事,将罪魁祸首指向童:“此大奇特奇案件一千人犯中之重要人也,竟属于日本东京女高师毕业,湖南女子教育开山老祖某先生之高足,并且具有太老师资格某

[1][2]兼公:《我对于第一女师范第八班学生所要说的话》,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14日。

[3][8]黄醒:《请大家用真面目来说理》,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14日。

[4]袁庸父:《我对于第一女师毕业生那封辩护信的意见》,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16日。

[5]熊梦飞:《湘教育界一个紧急问题——第一女师学科不完全》,载《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8日。

[6]柏荣:《读了“湘教育界一个紧急问题”以后》,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9日。

[7]黄醒:《关于第一女师八班课程之又一报告》,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10日。

乡老先生为太上校长,素以经验自诩之某科长之高等顾问之童某”,不仅猛烈抨击童,且将她的几位老师一并予以炮轰,最后将一女师称为“湖南教育界罪恶的中心”^[1]。文中的用词显然过于激烈,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超出了理性批评的限度。

4. 童锡帧的去职与复职

尽管“第一女师学科不完全”问题在报纸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但省署并无反应。为发挥舆论的监督力量,8月20日,黄醒、熊梦飞、杨国基、周谷城、刘瑛、陈庆曾、谭异才、亚文等联名致函省长要求彻查一女师校长。

彻查的理由有三条:其一,为师范教育计,“窃思初级教育为国家命脉所系,师范人才又初级教育之本。故办理师范学校者自宜分外振作精神综覆名也”。其二,为教育前途计,“伦理学、教育学等,为教授小学生之根本知识,并此不知,更何言师范耶?该校校长非丧心病狂,亦何至欺政府、欺社会以自欺,至如此极,使各校群起效尤,则教育前途何堪设想”?其三,整治一女师刻不容缓,“该校行政方面,组织之不良;经济方面,开支之暧昧;学风之腐败,功课之敷衍,人言啧啧,断非无因,非加彻查”。最后要求“请特派公正贤员,将该校长溺职舞弊各节,彻底查究,予以撤换”^[2]。3天后,《大公报》公布省署批示:“派员彻查第一女师范校长溺职舞弊情形,请依法撤惩以维教育”,并称该案已交教育会干事查复^[3]。如此之多的男性精英联名要求撤销童锡帧校长之职,反对的声音不可谓不强大,童被撤职似在所难免。

在联署信发布后名,童再次提出辞职,“自称先行赴沪各情”^[4],这是第四次请辞。此情此景下,省署理应允其要求。奇怪的是,2个多月后,《大公报》却刊发省署挽留童校长之公文,申明系省长赵恒惕指令慰留,言辞恳切,用了诸如“整理校务,竭尽全力,本省长亲所深知”,“驾轻就熟,犹奈贤能”,“久著贤能,岂可任其飘然远行”等赞许之词,指令校办事员“迅速前往迎归,继续任职”^[5]。尔后童勉强继任。身处舆论漩涡达3个多月之久的童竟如此超然,也许是秉持“清者自清”古训之故吧?!以笔者的后见之明观之,童的“无声抗议”之策略,最终达到“无声胜有声”之效果。

三、女校长被《大公报》推上舆论前台的历史语境

深度解读围绕两桩社会事件发表的时文,不难看出,两位女校长成为报纸媒体报道的中心人物,与湖南特定的历史语境密不可分。

1. 地方主义盛行和制宪自治运动为女校长登场营造了社会氛围

女校长群体在湖南的崛起,一则是清末女学生留学热潮的直接成果^[6],二则与湖南地方主义盛行和制宪自治运动密不可分。时人常将湖南建设与整个中国的政局区分开来,湖南作为一个“地区”的特殊性不断被提及,尤其是制宪自治时期。譬如为争取女子继承财产权,时评凸显湖南女子的特殊性:“希望湖南的女子,打起精神,唤醒全国女界,大家争得这种权利;希望湖南的女子,极力向知识学

[1]亚文:《湖南教育界罪恶之中心?》,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14日。

[2]《黄醒等请澈查一女校长》,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20日。

[3]《呈控第一女师校长之批示 交教育会干事查复》,湖南《大公报》1922年9月23日。

[4]《童校长复职消息——原来在岳麓山找着》,湖南《大公报》1922年10月30日。

[5]《省署挽留童校长之恳切》,湖南《大公报》1922年10月26日。

[6]为解决师资紧缺问题,湖南当局曾于1905年选派20名女学生赴日本实践女校习速成师范,此举为我国官派留日女生之肇始,首开湖南女子留学之风气,唐群英、王昌国、张汉英、童锡帧、欧阳骏均系留日生,曾宝荪曾留英,留学经历为她们被推举为校长提供了必要的资质条件。

问的路上进行;希望湖南的女子,对于这不经血汗而成功的事情,勿轻易放过。”^[1]为获得女子选举权,更有人大声疾呼:“省宪法上既经规定男女对于选举有平等的权利,是想把中国人这种罪恶,由湖南人立地洗除。是男子悔悟的先声,是女子光明的大道。”^[2]选举权获得后,论者更是喜不自禁:“一千余年雌伏在男权之下之湖南女同胞,一旦忽然先中国先亚洲而取得欧美恰才争到与男子公法上平等的权利,喜可知也。”^[3]

在与相馆的纠纷中,欧阳骏驾轻就熟地援引省宪为自己辩护:“湘省宪法对于人民权利均有保障省宪第二章第六条规定,人民有保护其身体生命之权,身体生命犹有保障,名誉为吾人第一生命,当然予以保障。”^[4]在围绕“第一女子师范学科不完全”展开的论辩中,罗敦伟指出:“联省自治开幕,宪法也在可字上宣布了。我湖南女界要算不劳而获地得着政治上的平衡,教育上的平衡……第一女师对于此后湖南女子教育的责任,不是更担任一大部分吗?”尽管“不劳而获”有违历史事实^[5],但对女子教育责任的强调还是言之成理的:“现在世界教育趋势是一天天不同的,你们决不可依你们陈腐的脑筋,拒绝新的思想,教育是应时代要求的,你们决不可把他做一个古物陈列所。”^[6]

2. 报纸媒体借炮轰女校长之机针砭省教育当局

报纸媒体的特性决定其关注的往往是具革新价值的议题。欧阳骏与相馆之间的纠纷因涉及女子肖像权,无疑具革新价值,故受到报人亲睐,最终发挥一箭双雕之功效,既倡导了五四以来宣扬的女性人格独立的新观念,又为新女性确立并强化主体性身份提供舆论支持。

在围绕“第一女子师范学科不完全”展开的舆论讨伐战中,表面上矛头指向童,但深入背后会发现省教育科才是讨伐的真正靶子。署名“行真”的读者最早将矛头对准教育科,列出如下黑幕:其一,“教育科乃是做官的地方”,没有学过教育学的当科长、校长和教职员的大有人在。其二,童校长被人包围,管理受牵制,“某学校为某系的地盘,某学校为某派的根据地的消息,都听着了。我想那些包围童校长的人,也不过是拥护他们的地盘就是了!”其三,女校生态堪忧,“某私立女学校,一时的高兴,大行解放;一时的又变本加厉,仿行科举式的会考”。其四,地盘主义突出;最后提议举出一个有学识、有魄力的教育家主持一女师^[7]。柏荣亦指出“童校长自知知难而退,曾三次辞职”,但当局再三慰留,还把“成绩颇著”改为“成绩卓著”,把“颇具热情”改为“甚具热忱”,据此责问“该班未受教育学,早已宣传中外,贵科公忙,亦曾见及之否?”“各学校教育效率的考查,到底应不应该注意,到底是不是你们天职”?其中的“贵科”、“你们”显然指教育科;最后以同情的口吻对童说:“你的环境太恶劣了,上有两个太上校长,旁边还有许多包围你的,纵你有三头六臂的本领,也不能打破重围,而将学校弄好。”^[8]罗敦伟鲜明地指出教育科不加监督是“腐败的一个极大的原因”,认为一女师起死回生的良方是教育界“尽起监视”^[9]。徐特立在从巴黎寄回的投稿中谈及自己的七种担忧,其中两条涉及教育科:一是“怕舆论上专咎该校校长、教务及该级主任其他有关的人,如省教育科视学仍漠然不动心”;二是怕教育界以为换一个校长就万事大吉^[10]。不难看出,湖南教育界积习已久,童不过充当代罪羔羊罢了。

[1]平子:《我对于女子参政的希望》,湖南《大公报》1921年6月3日。

[2]四愁:《女子选举权》,湖南《大公报》1922年1月19日。

[3]《望女界努力从事选举运动》,湖南《大公报》1922年3月18日。

[4]《欧阳女校长来函辨正——与照相馆交涉之真相》,湖南《大公报》1922年7月14日。

[5]参见《对20世纪二十年代湖南女子参政运动的考察》,〔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6][9]罗敦伟:《敬告第一女师当局及办学人员》,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11日。

[7]行真:《我也谈谈湖南的教育》,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12日。

[8]柏荣:《读了“湘教育界一个紧急问题”以后》,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9日。

[10]徐特立自巴黎投稿:《请湘教育界诸公注意》,湖南《大公报》1922年10月29-31日。

3. 精英男性藉报纸媒体释放对“女子自决”的焦虑

文学批判理论中有个公论:将女人物化为表现的手段,在男人创造的世界里充当负有具有道德或艺术含义的符号。精英男性对女校长的评判就承载了社会道义的考量,似乎他们天然居于道德的高地,如黄醒、熊梦飞、亚文、袁庸夫等在对童的声讨中,用辞之尖刻,情绪之激愤,远超出理性的限度,折射了他们对以女校长为代表的女子自决的矛盾心态。

黄醒在首篇报道中,将女性排除在湖南教育界“诸位先生”之外^[1],有意无意地以性别划界。在其他檄文中,始终站在男权立场、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批评女子办学:“现在许多男子尚极力谋女子教育的进步,极力造成女子受教育与男子平等的机会,不道该校以女子办女学校,居然不惜贼人自贼、自骗骗人……我不能不为湖南全体女子羞了。”^[2]另文将女子师范与男子师范对比后,谴责道:“所谓蹂躏女子之子弟,不是我们了。你们说话要留神一点。常知不肖之男子,不必定是我们。能自决的女子,也不必只有你们鬼校长。”^[3]这里的“我们”与“你们”有着极鲜明的性别分野。

袁庸父同样站在男权立场对女子自决问题评头论足:“女子底合乎真理的自决,原是好的;难道不合真理的自决,也要听任伊们么?你们为女子的事业是女子单独所有毫无社会上连带关系的么?你们以为女子甚至合群结党无理地攻击异己骚乱社会,及不可言尽的有害人类的等等事情 也应该有攻击的舆论么?”^[4]言下之意是,“女子自决”须受限制,至于由谁来确立规则似乎不证自明。对于此番言论,第八班毕业生在辩护信中提出质疑:“似觉含有女子教育不能由女子自决之意。试问诸先生在三四年前,曾有半个堂堂男子为敝女子师范提议改良办法增加女子学问程度乎?”^[5]袁回应道:“纵使男子们先前对于女子教育,没有从事提倡,不免有些罪过。但后来的从觉悟而改变的自新;怎见得也错误呢?况先前的不提倡,实有事实上不曾有的理由,并且还怪不得他们!”显然在为男子辩护的同时,推卸自身责任。袁最后还警告道:“如果有些人们,假借自由解放的名义,以垄断女子教育……我们断不能任其蹂躏,作这等无代价无智识的牺牲……不使我们全人类的神圣的幸福,受伊们少数人的影响。”^[6]这里的“伊们少数人”暗指成立于1921年的湖南女界联合会^[7],言下之意是女子教育应由男性来掌控,否则就是垄断,言辞中渗透着对女子自决的焦虑。

四、结 语

围绕两位女校长在《大公报》上展开的舆论大战,先后持续3个多月,欧阳骏的主动发声与童锡桢的无声抗议,相映成趣又意味深长。

首先,两风潮折射出民国报刊媒体拥有主导乃至操纵舆论的话语权。美国学者柯瑞佳曾指出,1920年代后中国的报刊业成为一种兼具经济与意识形态意涵的产品,媒体在介绍或形塑某种社会价值观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将都市私生活予以揭发与报道,将之转化包装为新闻事件,藉以讨

[1]黄醒:《质问湘中各教育家及第一女师范学生个家长。初级师范生应不应学教育学》,湖南《大公报》1922年7月29日。

[2]黄醒:《关于第一女师八班课程之又一报告》,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10日。

[3]黄醒:《请大家用真面目来说理》,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14日。

[4][6]袁庸父:《我对于第一女师毕业生那封辩护信的意见》,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16日。

[5]《来函》,湖南《大公报》1922年8月13日。

[7]1921年1月,由陈俶、吴剑、李左汉等邀集长沙热心妇运的女校校长和教职员成立湖南女界联合会,以“争回人格,恢复人权,保障女子生活,改良家庭”为职志(参见《湖南女界之自治意见》,载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3月28日)。翌年9月,王昌国、唐群英、吴家瑛、曾宝荪、童锡桢、陈俶、欧阳雅文(欧阳骏)、关华骏、李宗莲、李权名等,以“巩固省宪,发扬民治精神”为宗旨,草拟宣言书及简章,纠合同志,拟组织一个叫“平社”的政党。女界的结社乃至组织政党显然给男性精英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与焦虑。(参见《女界组织政党——平社》,载湖南《大公报》1922年9月28日)。

论、提出或强化某些观念^[1]。一旦私事被披露成为公论之后,报刊便开放篇幅,不惜血本针对主题,利用编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抒发心中的愤懑之情,成为可以左右或操纵舆论的重要载体^[2]。欧阳骏与照相馆之间的纠纷被《大公报》不厌其烦地刊载,并促其解决,正基于此。尽管“第一女师学科不完全”属于公共事件,但与女性任校长执掌校务有关,亦得以长篇累牍的报道。

其次,两风潮反映男性报人对女校长形象塑造有着舆论主导权。自清末以来以男性为主体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背景中提出有关“新妇女”、“现代妇女”等种种言说,其内容与其说是反映着妇女新角色的描述,无疑更是代表着各时代男性知识分子藉由妇女问题的讨论,所显现出来的对于国家现代化的企望及想象,甚至有着再度确认男性作为道德启蒙及伦理卫戍者角色的作用^[3]。因此,他们惯于按理想模式对女性进行塑造,后者一旦违背预设的理想模式,就会受到批评^[4]。童锡帧及背后的湖南女界联合会因违背了知识界精英男性认同的标准,超出其承受的限度,故受到他们的冷嘲热讽、联手围攻及至彻查驱逐,其中渗透着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

最后,两风潮揭示了民国时期职业女性所处的尴尬境遇。无论是欧阳骏的主体言说,还是童锡帧的无声抗议,都能从中感受到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女性遭遇到的困局。事件虽小,但背后潜藏着诸多复杂面向,尤其是社会性别不平等带来的性别博弈清晰可辨,这或许是许多性别论述迄今仍一再的重复,依旧是解不开的结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肖波〕

Female President's Subject Expression and Silent Protest in Republic of China: Focusing on the Reort in *Dagong Newspaper* in Hunan Province

Wan Qionghua

Abstract: OuyangJun, female president of the third provincial women school, andTong Xizheng, female president of the first provincial women school, were pushed successively by the Hunan Dagong newspaper to the cusp of public opinions and became the focus of the public concern in 1922, even suffering more than one-month attack from elite males especially after the problem of incomplete subjects was disclosed in the first provincial women school. Through analyzing those related reports published at that time, the present paper finds it interesting that the two female presidents had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 the former taking an offensive one while the latter taking a defensive one. Considering the two things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in Hunan, we can see why two female presidents became the focus of the report and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those professional women in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ender power game behind.

Keywords: female president; subject expression; silent protest; Hunan *Dagong Newspaper*

[1]Rebecca E.Karl, "Journalism, Value, and Gender in 1920s China"发表于台湾东海大学社会系专题演讲, 2005年5月2日。

[2]许慧琦:《训政时期的北平女招待(1928-1937)——关于都市消费与女性职业的探讨》,鲍家麟编著《中国妇女史论集》(八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8年版,第376页。

[3]柯惠玲:《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妇女(1900-1920)》,[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4]颜洁:《才女神话的历史谱系与当代生成——以“知女”事件为中心》,[北京]《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2期。